

## 第二章 北宋翰林學士的人事分析



### 第一節 資歷的背景

宋代是科舉興盛的時代，許多重要考試制度皆於此時形成。如殿試的實施、三年考試一次、防弊措施的出現(騰錄、彌封等)等，最重要的是錄取名額增多，許多貧微之士藉此步入仕途。因此政治不再由世家大族所把持，形成宋代獨特的士大夫文化。學者認為科舉考試的實施，不僅保證了執政大臣的知識水準，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知識階層中產生異己力量。作為由和平過渡而誕生的趙宋政權，其布衣大臣之多，是前此同類政權中所沒有的。<sup>1</sup>

北宋翰林學士資歷的背景為何？是否多是經由科舉考試出身？世家大族是否仍具有獨特的影響力？在分析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界定所欲分析的對象。北宋總計任命了 228 位翰林學士，這些人當中，包含了跨朝入充翰林者，<sup>2</sup>若扣除這種特殊的情形，北宋實際任命了 200 位翰林學士。為何將跨朝者分別列入不同朝代作為分析對象？這是因為跨朝擔任翰林學士者，在不同朝代中，其政治影響力亦有所不同。

<sup>1</sup> 張其凡，〈北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說〉，《宋初政治探研》(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64。

<sup>2</sup> 這些人包括跨兩朝者，如李昉(太祖朝、太宗朝)、扈蒙(太祖朝、太宗朝)、宋白(太宗朝、真宗朝)、宋湜(太宗朝、真宗朝)、盛度(真宗朝、仁宗朝)、劉筠(真宗朝、仁宗朝)、晏殊(真宗朝、仁宗朝)、李維(真宗朝、仁宗朝)、李諮(真宗朝、仁宗朝)、賈黯(仁宗朝、英宗朝)、蔡襄(仁宗朝、英宗朝)、沈遘(英宗朝、神宗朝)、曾布(神宗朝、哲宗朝)、許將(神宗朝、哲宗朝)、鄧潤甫(神宗朝、哲宗朝)、蔡京(哲宗朝、徽宗朝)、蔣之奇(哲宗朝、徽宗朝)、王孝迪(徽宗朝、欽宗朝)；跨三朝者，如張方平(仁宗朝、英宗朝、神宗朝)、錢明逸(仁宗朝、英宗朝、神宗朝)、王珪(仁宗朝、英宗朝、神宗朝)、范鎮(仁宗朝、英宗朝、神宗朝)、馮京(仁宗朝、英宗朝、神宗朝)。

為了表示北宋各個皇帝的任命翰林學士的實況，故將跨朝者分開計算。

## 一、個人出身

茲將北宋各朝所任命的翰林學士依進士、賜進士出身(包括賜進士及第與賜同進士出身)、諸科(科舉諸科與制科)、蔭補、其他五類，分析其出身如下：

表 2-1：北宋翰林學士出身統計表

帝號	學士 人數	進士		賜進士出身		諸科		蔭補		其他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太祖	9	7		0		0		0		2	
太宗	17	15		0		0		0		2	
真宗	22	19		2		0		1		0	
仁宗	58	46		5		6		1		0	
英宗	9	7		0		2		0		0	
神宗	37	33		0		2		2		0	
哲宗	21	18		0		1		2		0	
徽宗	42	35		4		0		0		3	
欽宗	13	11		0		1		0		1	
總計	228	191	83.8	11	4.8	12	5.3	6	2.6	8	3.5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  
《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若同時擁有兩項出身者，以進士為其主要出身。

由上表可知，北宋各朝總計任命之 228 名翰林學士當中，進士出身者有 191 人，佔 83.8%；賜進士出身者有 11 人，佔 4.8%；諸科出身者有 12 人，佔 5.3%；蔭補出身者有 6 人，佔 2.6%，其他則有 8 人，佔 3.5%，可見進士出身者佔了絕對的優勢。

為了突顯翰林學士裡進士出身的情況，可以將其拿來與宋代官員整體出身做一個比較。學者針對《宋史》列傳記載人物的出身進行分析，指出這些宋代官員當中，進士出身者佔 64.1%，諸科出身者佔 3%，蔭補出身者佔 16.5%，可見進士出身是宋代官員最普遍、基本的出身，<sup>3</sup>而翰林學士進士出身者的比例又高出許多。由於進士科出身者為翰林學士出身的最大來源，故宋徽宗於崇寧五(1106)年下詔明文規定：「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今後並除進士出身。」<sup>4</sup>

首先，先來看一下進士科中的佼佼者。翰林學士當中，有許多擁有狀元榮譽者。這些狀元分別是呂蒙正、蘇易簡、楊礪、梁顥、王曾、李迪、蔡齊、陳堯咨、徐奭、張觀、宋庠、王堯臣、王拱辰、呂溱、賈黯、馮京、鄭獬、許將、徐鐸、蔡薺、何臬、莫儔等人。宋人尹洙曾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sup>5</sup>可見考中狀元者之榮寵。這些具有狀元身分的人計有 22 人，佔翰林學士的 11%。進士第二者，有錢易、葉清臣、沈邁等人，其中沈邁原本也可以成為狀元，不過他先前已先以蔭補入仕，大臣們認為「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沈邁為進士第二。<sup>6</sup>李諮、滕元發等人則為進士第三名。范鎮、舒亶、孔武仲等人則為解元(貢舉第一名)。此外，有了進士功名後，仍有不少人繼續向上爭取更好的制科出身。例如田況，先中進士，後又中賢良方正科。范百祿進士及第後，又舉才識兼茂科。

若未經由進士科出身，而皇帝又欲重用者，往往下詔賜其進士出身，「元非科舉入仕而特蒙大用，或賜同進士出身，方可執政。」<sup>7</sup>這種情況在宋太宗以後日趨普遍。原有的進士科出身，若再加上賜進士出身者，其比例則達到 88.6%。此外，若再加上制科、其他諸科等科舉相關科目及第者，北宋翰林學士經由科舉出身者之比例，將高達

<sup>3</sup> 苗書梅指出，宋史列傳(不包括后妃、宗室、列女等傳)記載的宋代官員共有1397人，其中進士科出身者有895人，諸科出身者有42人，蔭補出身者有231人。參見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07。

<sup>4</sup> 《宋會要輯稿》，職官 3之10下。

<sup>5</sup> (清)潘永因編，《宋稗類鈔》(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據清康熙八年刊本影印)，卷2，科名，頁41-42。

<sup>6</sup> 《宋史》，卷331，沈邁傳，頁10651。

<sup>7</sup> (宋)趙昇，《朝野類要》(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卷3，頁36。

93.9%。因此，有必要對非進士科出身之翰林學士，做一個說明。

賜進士出身者。其名目有賜進士及第，如楊億、晁宗慤、李淑、楊偉、林攄、俞橐；賜進士出身，韓駒；賜同進士出身，如晏殊、宋綬、傅墨卿。

楊億從小就是一個天才兒童，七歲就能屬文，十一歲時宋太宗聞其名，命官試之，宰相也對其才學感到驚訝，於是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楊億的任官制書為「汝方髫鬣，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sup>8</sup>可見宋朝君臣對楊億年少才學所寄予的厚望。楊偉為楊億之弟，從小跟著楊億學習，天禧元(1017)年為宋真宗獻頌，皇帝命其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sup>9</sup>晁宗慤本以父蔭出任為祕書省校書郎，不過他屢屢向宋真宗獻上歌頌之作，皇帝召試之，於是賜進士及第。<sup>10</sup>李淑「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仁宗即位，修纂《真宗實錄》有功，召試後賜進士及第。<sup>11</sup>林攄以父蔭出任敕令檢討官，後來朝廷命其出使監察河北，臨行前，向宋徽宗陳河北得失利害，為皇帝所喜，特賜進士及第，留用為起居舍人。<sup>12</sup>俞橐則以上舍生身份賜進士第。<sup>13</sup>賜進士及第者，或從小就在文章上享有盛名，受到皇帝的注目；或表現個人獨特之才華，受到皇帝矚目，因此獲得進士及第之功名。

韓駒「少有文稱」，政和初年，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sup>14</sup>晏殊七歲就能屬文，景德初年，張知白以神童之名推薦給皇帝，皇帝於是召晏殊與進士千餘人一同參與殿試。晏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受到皇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sup>15</sup>晏殊雖未參與科舉考試，不過已有考試之實。這樣一個神童，任官後依然好學不倦，其「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sup>16</sup>宋

<sup>8</sup> 《宋史》，卷305， 楊億傳 ，頁10079。

<sup>9</sup> 《宋史》，卷305， 楊偉傳 ，頁10084。

<sup>10</sup> 《宋史》，卷305， 晁宗慤傳 ，頁10087。

<sup>11</sup> 《宋史》，卷291， 李淑傳 ，頁9740。

<sup>12</sup> 《宋史》，卷351， 林攄傳 ，頁11110。

<sup>13</sup> 《宋史》，卷354， 俞橐傳 ，頁11169。

<sup>14</sup> 《宋史》，卷445， 韓駒傳 ，頁13140。

<sup>15</sup> 《宋史》，卷311， 晏殊傳 ，頁10195。

<sup>16</sup> 《宋史》，卷311， 晏殊傳 ，頁10197。

綬「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尚。」之所以有這樣的成果，全靠外祖父楊徽之的教導。徽之卒後，遺奏希望以宋綬補太常寺太祝，綬因此步入官場。宋真宗愛其文，後賜同進士出身。<sup>17</sup>傅墨卿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入仕。宣和四(1122)年以禮部尚書持節冊立高麗王楷有功，歸國後賜同進士出身。<sup>18</sup>由此可見，這些賜同進士出身之翰林學士，大多先以蔭補之資格進入北宋官場，之後表現良好，受皇帝喜愛而獲賜功名。

諸科出身者，有賢良方正科，夏竦、錢明逸、吳奎；茂才異等科，富弼、張方平；宏詞科，吳开；服勤詞學科，丁度；說書科，顧臨。

賢良方正科、茂才異等科等皆是制舉的科目名稱，由皇帝下詔臨時設置的考試科目，目的是要選拔各類特殊的人才。其考試難度為各科之冠，設置之初，鮮有人可以及第。據《宋史》記載夏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sup>19</sup>吳奎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先以五經科及第，後再中賢良方正科。<sup>20</sup>富弼「少篤學，有大度」，深受范仲淹的賞識。宋仁宗復設制科後，范仲淹認為其必可通過制科的考試，富弼果然舉茂材異等科。<sup>21</sup>張方平「少悟絕倫」，讀書過目不忘，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後果舉茂材異等科。<sup>22</sup>服勤詞學科是為了有才學而未能入仕，年高德紹之舉人而設置之科目。宋真宗大中祥符元(1008)年十月，皇帝下詔「令開封府及車駕所過州軍考送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其懷材抱器淪於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稱者，所在以聞。」<sup>23</sup>以此為出身者，僅丁度一人，史載丁度「強力學問」，喜讀尚書。<sup>24</sup>宏詞科為詞科的一種，是專門為了選拔草擬詔制人才而設置的特殊科舉考試科目。北宋翰林學士中只有吳开以此為出身。顧臨為說書科出身，其人「通

<sup>17</sup> 《宋史》，卷291， 宋綬傳 ，頁9732-9733。

<sup>18</sup> (宋)施宿撰，《嘉泰會稽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15， 侍從 ，頁6994-2。

<sup>19</sup> 《宋史》，卷283， 夏竦傳 ，頁9571。

<sup>20</sup> 《宋史》，卷316， 吳奎傳 ，頁10318。

<sup>21</sup> 《宋史》，卷313， 富弼傳 ，頁10249。

<sup>22</sup> 《宋史》，卷318， 張方平傳 ，頁10353。

<sup>23</sup> 《長編》，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癸丑條，頁1573。

<sup>24</sup> 《宋史》，卷292， 丁度傳 ，頁9761。

經學，長於訓詁。」<sup>25</sup>諸科出身者，尤其是制科，多是當時博學通經的士儒，由這些人來擔任翰林學士十分合適。

蔭補出身者，有錢惟演、石中立、韓維、王益柔、趙彥若、錢勰。錢惟演吳越王錢俶之子，雖「出于勳貴」，不過「博學能文辭」，於書無所不讀，家中藏書可以和官方秘府相匹敵。曾召試於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受到宋真宗的稱讚。<sup>26</sup>錢勰為錢惟演之從孫，五歲時就能日誦千言。熙寧三(1070)年應試賢良方正科，雖已通過廷對，不過恰逢王安石惡孔文仲的對策，遷怒罷其科，因此錢勰遂不得第。<sup>27</sup>石中立熟悉臺閣故事，經過他校讎後的罕見書籍，人們皆爭相流傳之。又與當時文壇大家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等人相善，可見其才學亦不遑多讓。<sup>28</sup>韓維本已通過鄉貢的科舉考試，不過適逢其父韓億輔政，所以他不肯參加殿試，改受父蔭入官。<sup>29</sup>王益柔「少力學，通群書，為文日數千言。」之所以未中科舉，乃因當時是以詩賦取士，益柔故不為之。其才學，深受北宋諸位大臣的讚賞。尹洙評其文曰：「瞻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范仲淹推薦他試館職時，知道他不善詞賦，因此乞改試策論。司馬光談及他的好學精神時說到：「自吾為《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sup>30</sup>趙彥若以父蔭補為將作監主簿，十八歲時，「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策不入等。」<sup>31</sup>雖然沒有成功，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他的才學。這些蔭補出身的翰林學士，本身都擁有豐富的學識，並非依靠先人出人頭第，平庸無能之輩。

<sup>25</sup> 《宋史》，卷344，顧臨傳，頁10939。

<sup>26</sup> 《宋史》，卷317，錢惟演傳，頁10341-10342。

<sup>27</sup> 《宋史》，卷317，錢勰傳，頁10349。孔文仲當時之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王安石方得宋神宗重用展開變法。參見《宋史》，卷344，孔文仲傳，頁10931。

<sup>28</sup> 《宋史》，卷263，石中立傳，頁9104。

<sup>29</sup> 《宋史》，卷315，韓維傳，頁10305。

<sup>30</sup> 《宋史》，卷286，王益柔傳，頁9635-9636。

<sup>31</sup>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錄於《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卷60，趙彥若傳，頁490。

## 二、家世背景

唐代是世家大族勢力獨盛的時代，不論政治、經濟、教育，在各方面皆佔有優勢。到了宋代，因其基本國策注重文治精神，不斷有更多科舉出身的士人登上仕途，促進統治階層的新陳代謝作用，可使政治不為少數人所把持，加上過去的世族門閥觀幾已消失，士人遂更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備受禮遇。<sup>32</sup>在門閥衰弱，庶民興起的宋代社會當中，翰林學士中是否仍可以看到家族勢力的痕跡？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茲將北宋翰林學士的親屬關係列表如下：

表 2-2：北宋翰林學士親屬關係表

親屬關係		姓名	出身	在院時間
祖	從子	范 鎮	進 士	仁宗~神宗
		范百祿	進 士	哲 宗
孫	從孫	范祖禹	進 士	哲 宗
		錢惟演	蔭	真 宗
數	從弟	錢 易	進 士	仁 宗
	從子	錢明逸	賢良方正	仁宗~神宗
	從孫	錢 藻	進 士	神 宗
	從孫	錢 勰	蔭	哲 宗
祖	祖	張 洎	進 士	太 宗
		張 璪	進 士	神 宗

<sup>32</sup> 邱添生，論唐代中葉為國史中世下限說，《師大歷史學報》第15期，1987年6月，頁76。

父子	父子	李 昉 李宗諤	進 士 進 士	太祖、太宗 真 宗
	父子	晁 迥 晁宗慤	進 士 進 士	真 宗 仁 宗
	父子	梁 顥 梁 適	進 士 進 士	真 宗 仁 宗
	父 從子	胡 宿 胡宗愈	進 士 進 士	仁 宗 仁 宗
	父子	蔡 齊 蔡延慶	進 士 進 士	仁 宗 神 宗
	父子	蘇 紳 蘇 頌	進 士 進 士	仁 宗 哲 宗
	父子	鄧 綰 鄧洵仁	進 士 進 士	神 宗 徽 宗
兄弟	兄弟	竇 儀 竇 儼	進 士 進 士	太 祖 太 祖
	兄弟	李 沆 李 維	進 士 進 士	太 宗 真 宗
	兄弟	楊 億 楊 偉	進 士 進 士	真 宗 仁 宗
	兄弟	宋 庠 宋 祁	進 士 進 士	仁 宗 仁 宗
	兄弟	陳堯佐 陳堯咨	進 士 進 士	仁 宗 仁 宗
	兄弟	韓 絳 韓 維	進 士 陰	仁 宗 神 宗
	兄弟	王安石 王安禮	進 士 進 士	神 宗 神 宗
	兄弟	沈 邁 沈 括	進 士 進 士	英宗、神宗 神 宗



	兄弟	蘇軾 蘇轍	進士 進士	哲宗 哲宗
	兄弟	曾布 曾肇	進士 進士	神宗、哲宗 徽宗
	兄弟	吳育 吳充	進士 進士	仁宗 神宗
	兄弟	蔡京 蔡卞	進士 進士	哲宗、徽宗 哲宗
	兄弟	張康伯 張康國	進士 進士	徽宗 徽宗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  
《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此表參考楊果《宋翰林學士親屬關係一覽表》製成，載於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57-59。

由「表 2-2：北宋翰林學士親屬關係表」可以看出，翰林學士中具有家世背景者共有 50 人，佔全部翰林學士的 25%。而這 50 人的家世背景當中，分別為祖孫數代，10 人(佔 20%)；<sup>33</sup>父子關係，14 人(佔 28%)；兄弟關係，26 人(52%)，這些關係裡，又以兄弟關係佔多數。由此可見，就北宋翰林學士的家世背景而言，已不見唐代門閥獨盛的局面。在這些具有家世背景的翰林學士當中，以范鎮、錢惟演為首的翰林學士家族特別引人注目。這兩家人是北宋僅有的祖孫三代皆任職翰林學士的例子，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他們在社會階層流動激烈的宋代社會裡保持此項殊榮，值得深入探討。

先來說明范鎮一家的情況。范家為成都華陽人，他們可以說是川蜀地區的文人代表。薛奎嘗為北宋執政官，當其知益州時，一見范鎮便十分喜愛，讓他和自己的子弟一同於府中講學。薛奎要還朝時，亦

<sup>33</sup> 祖孫數代這項關係中，張洎、張瓌祖孫亦包含在內。此外，這些人的父子、兄弟關係將不另外計算。若欲納入計算，之後所列的父子、兄弟關係的比例將會提高。

帶著范鎮同行。<sup>34</sup>他人問及薛奎曰：「入蜀何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朝中宋庠、宋祁兄弟見其文，自嘆不如，於是三人結為好友。此時這三個人雖均為布衣，不過往後三人先後出任翰林學士。<sup>35</sup>范鎮何以得到薛奎如此的賞識？其人「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名氣大到連契丹、高麗等地皆傳誦其文章。對於族人，范鎮總是能加以愛護，其人「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sup>36</sup>范百祿即是在叔父范鎮的照顧下，逐漸成才，百祿「少力學」，先進士及第，後又中制科。<sup>37</sup>范祖禹之父為范百之，百之為范鎮之兄范鏞的兒子。祖禹幼孤，叔祖范鎮將其視為己子，悉心照顧。祖禹也因自小失去父親，而不願參加親友聚會，終日閉門讀書。長大後前往京師開封，所與交游者，皆當時名人。范鎮更加器重他，認為「此兒，天下士也。」<sup>38</sup>

《宋史》於范氏三人傳後之評論到：

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sup>39</sup>

此中一語道破范氏家族得以三代皆得以任職翰林之原因，范鎮當為首要功臣。范鎮仕宦發達之後，同時亦兼顧其族人。百祿受學於鎮，祖禹更是被鎮視為己子般的照顧，因此造就了范氏祖孫三代皆為翰林學士的榮譽。

<sup>34</sup> 薛奎於天聖四年(1026年)三月出知益州，天聖六年(1028年)三月回朝任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參見《長編》，卷104，天聖四年三月己卯條，頁2403；同前書，卷106，天聖六年三月辛酉條，頁2469。

<sup>35</sup> 《宋史》，卷337，范鎮傳，頁10783。

<sup>36</sup> 《宋史》，卷337，范鎮傳，頁10790。

<sup>37</sup>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錄於《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卷77，范百祿傳，頁646。

<sup>38</sup> 《宋史》，卷337，范祖禹傳，頁10794。

<sup>39</sup> 《宋史》，卷337，論曰，頁10800。

接著來看錢惟演這一家族。錢家為杭州臨安人，可以視為兩浙地區的文人代表。錢惟演、錢勰雖以蔭補出身，不過都是才學豐富之士。錢易「才學瞻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蘇易簡將其比擬為詩仙李白。<sup>40</sup>錢易有二子，一為彥遠，一為明逸，父子三子皆中賢良方正科，時人稱盛。<sup>41</sup>錢藻為錢易之孫，彥遠之子，幼孤，刻苦為學。<sup>42</sup>

《宋史》對錢氏諸人的評論曰：

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俊，明逸以傾險，並為時論所憾云。<sup>43</sup>

錢氏家族之所以能夠成為翰林世家，除了自身的努力向學之外，還與他們採取的措施有關。他們的憑藉，包括世家地位、科舉入仕、恩蔭補官和婚姻締結。若再深入探討，錢家各支因為宋室待遇的不同，可分為上、中、下三等。

上等的是錢俶一支，因為錢俶保持國王的封號，諸子都授節度使和團練使等高級武官，而嫡系更自真宗時開始，享受「錄諸國後」的權利，恩典不絕，錢惟演即屬此支。錢惟演除了自身發奮圖強外，他定下了文武雙軌發展和與帝戚聯婚的策略，同時採取修族譜以繫宗族、編諸王遺著以興家學、重庭訓以鞭策子弟、請朝廷修杭州家廟，尊錢俶為尚父等策略，以振興家族。

中等的是錢俶兄弟各支，依其成員的年紀和在吳越的官位而授官或職，但後代大多數不能再享受此優待，錢藻即屬此支。錢藻憑靠科舉入仕，進入中央之後，出任一連串的清要之職，認識了一班館閣之士，藉由與他們的交往，維持家族。

下等的包括錢昆和錢易兄弟，他們是錢俶異母兄遜王侁的幼子，只具有平民身分，賴科舉入仕。錢易、錢明逸、錢勰即屬此支，他們致力於科舉考試，因此才會有「三世制科」的盛事。<sup>44</sup>

<sup>40</sup> 《宋史》，卷317， 錢易傳 ，頁10344。

<sup>41</sup>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錄於《二十五別史》，卷48， 錢明逸傳 ，頁384。

<sup>42</sup> 《宋史》，卷317， 錢藻傳 ，頁10348。

<sup>43</sup> 《宋史》，卷317， 論曰 ，頁10352。

<sup>44</sup> 柳立言， 北宋吳越錢家婚宦論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4分，1994年12月，頁903-955。

以上范、錢兩個家族，皆屬南方的文人。范氏家族的成功，全賴范鎮敬宗收族的努力；錢氏家族的榮寵，憑藉的是世家地位、科舉入仕、恩蔭補官和婚姻締結。

既然門閥已不具優勢，那麼眾多的翰林學士的家世背景又是如何？是否就如一般所言，科舉考試促成寒微子弟的興起？以下略舉數例。王禹偁世為農家，以磨麵為生。<sup>45</sup>張方平家貧無書，曾向人借三史，旬日即歸之。其人不但看書之快，亦有過目不忘之能，凡書皆一閱不再讀。<sup>46</sup>歐陽修「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sup>47</sup>其他如李至、梁顥、韓丕、王曾、李迪、蔡齊、柳植、吳奎等人，率多是年幼即孤，出身寒微之人，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出人頭地，全賴科舉考試的實施。

其他出身者，陶穀、歐陽炯、湯悅、徐鉉、詹乂等 5 人雖出身不詳，不過率多為文學豐富之士。陶穀「十餘歲，能屬文」，並且是五代的文壇領袖之一。<sup>48</sup>歐陽炯「好為歌詩」，著作頗豐。<sup>49</sup>湯悅為南唐宰相，其文采為周世宗所讚賞。<sup>50</sup>徐鉉「十歲能屬文」，歸宋後，入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四(979)年，從征太原，徐鉉寫作軍中書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sup>51</sup>詹乂生平事蹟不詳，故無法得知其學識如何。此外，李邦彥為太學上舍及第，吳敏則為辟雍考試的首選，辟雍為州縣學校的學生進入中央太學之媒介，這是崇寧元(1102)年蔡京請建外學的成果。

州縣官是宋代基層文官，翰林學士當中，亦有不少人在任職之前擔任過這類親民官員。歐陽修談及翰林學士的選拔方式時，便指出「其

<sup>45</sup> 《宋史》，卷293，王禹偁傳，頁9793。(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收錄於《宋名臣言行錄五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9，內翰王公禹偁，頁3上。

<sup>46</sup> 《宋史》，卷318，張方平傳，頁10353。

<sup>47</sup> 《宋史》，卷319，歐陽修傳，頁10375。

<sup>48</sup> 《宋史》，卷269，陶穀傳，頁9235。

<sup>49</sup> 《宋史》，卷479，世家二 西蜀孟氏，頁13895。

<sup>50</sup> 湯悅，宋史無傳。其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江南為宰相。建隆初，宣祖諱，改姓湯。初在吳為舍人，受詔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畫江後，中主遣悅入貢，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為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於嗟重，當時朝臣沈遇、馬士元皆以不稱職，改授他官。復用陶穀、李昉為舍人，其後擢用扈載，率由此也。參見(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40，文章四六，頁524。(宋)楊億，《楊文公談苑》，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湯悅，頁525。

<sup>51</sup> 《宋史》，卷441，徐鉉傳，頁13044-13045。

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才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擢而拜者。」<sup>52</sup>  
茲將翰林學士出任前曾任州縣官員的比例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 2-3：北宋翰林學士曾任州縣官員統計表

帝 號	學士人數	曾任州縣官員		未曾任州縣官員		不 詳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太 祖	9	8	89	1	11	0	0
太 宗	17	15	88	2	12	0	0
真 宗	22	18	82	4	18	0	0
仁 宗	58	47	81	7	12	4	7
英 宗	9	8	89	1	11	0	0
神 宗	37	33	89	4	11	0	0
哲 宗	21	19	90	2	10	0	0
徽 宗	42	24	57	8	19	10	24
欽 宗	13	4	31	3	23	6	46
總 計	228	176	77	32	14	20	9

資料來源：

《宋史》、《東都事略》、《隆平集》、《名臣碑傳琬琰集》

表中所載根據每人任職翰林學士之前，首次擔任的州縣官職而進行的統計。

由「表 2-3：北宋翰林學士曾任州縣官員統計表」可知：成為翰林學士之前，77%的人員曾經於基層州縣任職。這些具備文學長才的翰林學士，經過州縣的磨練後，不但培養了個人的行政能力，同時又可使之明瞭民間疾苦，當他們成為皇帝侍從之後，便有助於協助皇帝治理國家。這與明代晚期以後，翰林學士們只知吟詩作賦的情況截然不同。<sup>53</sup>

要之，就翰林學士的資歷而言，其個人出身以進士科為主要來源，

<sup>52</sup> (宋)歐陽修，上仁宗論學士不可令中書依資差除，收錄於(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49，頁535。

<sup>53</sup> 楊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2-63。

比例達到 83.8%。家世背景方面，則率多為寒微之士出身。具有家世背景者，僅佔 25%，其中又以兄弟關係佔最多數。范鎮、錢惟演兩個家族則是北宋僅有的祖孫三代皆榮登翰林的特例，范氏家族的成功，全賴范鎮敬宗收族的努力；錢氏家族的榮寵，憑藉的是世家地位、科舉入仕、恩蔭補官和婚姻締結。可見唐代世家大族獨盛的情況已不復見，這種情況的產生，又是宋代實施科舉考試的結果。翰林學士當中，有 77% 的人員曾經於基層州縣任職，因此這些翰林學士不論在文學還是行政方面，都具備良好的才能。

## 第二節 地域的分佈

北宋是一個幅員相當遼闊的王朝，各地的地理環境互不相同，因此培養出天賦秉性、文化素養不同的人們。宋朝著名理學家程顥說：「西北東南，人才不同。」<sup>54</sup>另一個宋人李廌也談到：「東西南北人，志向各有在。」<sup>55</sup>這些話皆指出宋人的地域性差異。亦有進一步指出南北不同者，謝采伯云：「北方人物、果蓏，長大便自與江南不同。」<sup>56</sup>在宋代，這類南北有別的言論比比皆是。北宋時期，尤其是北宋前期，南人、北人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為北方人士對南方人士的輕蔑與排斥。這種現象的產生，和宋朝開國的經過有關。宋朝的建立，繼承了後周的北方疆域，進而統一天下，對於新歸屬的南方諸國地區，不免存有防備之心，因此在官員任用方面，多以北方人士為主，導致人才的南北地域差別。<sup>57</sup>擔任翰林學士者，可謂是文人中文人，菁英中的菁英，即使同樣擁有豐富的學識，不過卻也因為生長地區的不同，而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表現。

進行北宋翰林學土地域分布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說明宋代地域的劃分問題。首先，關於北宋的行政區劃。宋代地方行政區劃分為三

<sup>54</sup> (宋)程顥，《河南程氏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3，頁67。

<sup>55</sup> (宋)李廌，《濟南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谷隱飲中以采菱渡頭風起策杖村西日斜為韻探得采頭二字」，頁23上。

<sup>56</sup> (宋)謝采伯，《密齋筆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頁13下-14上。

<sup>57</sup>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6。

級，即最高一級為路，次級府、州、軍、監，基層為縣。以路級的行政區劃而言，宋太祖朝~宋仁宗朝屢有變更，不過基本保持 18 路 1 京(指京城所在的開封府，在北宋為特別的行政區域)的情況。宋神宗時期將全國行政區域調整為 23 路 1 京(指轉運使路)。宋徽宗時期全國分為 26 路，除了開封府改為京畿路外，在宣和四(1122)年設置了燕山府、雲中府二路。這兩個新設的路，是北宋實行聯金滅遼的成果，宋朝收復了燕京以及其中六州之地。北宋時期的行政劃分，以 18 路 1 京的情況時間最為長久，故以其為分析的基本地域區劃。這 18 路 1 京分別是指東京開封府(北宋末年稱為京畿路)、京東路(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路(京西北路、京西南路)、河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陝西路(永興軍路、秦鳳路)，以上諸路屬於北方地區；淮南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路、江南東路(簡稱江東路)、江南西路(簡稱江西路)、福建路、荊湖北路(簡稱湖北路)、荊湖南路(簡稱湖南路)、夔州路、利州路、梓州路、成都府路、廣南東路(簡稱廣東路)、廣南西路(簡稱廣西路)，以上諸路屬於南方地區。

其次，宋代尚有一種大區域劃分的觀念。宋代以京城開封府以及京西路為中心，將全國區分為五大塊：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川蜀。東北指的是京東路；西北指的是河北、河東、陝西等路(宋人常以西北三路稱呼，或直接簡稱「三路」)；東南指的是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路；西南指的是廣東、廣西等路；川蜀指的是夔州路、利州路、梓州路、成都府路等，或直接稱為「四川」。另外，有時候按東、西、南、北四方位將有關州郡或地區泛稱為東州、西州、南州、北州等。<sup>58</sup>

如上所述，若以北宋的行政區劃進行分析，或失於瑣碎，例如情況類似的京西路，為了行政方便，又細分為南、北兩路。今日的四川盆地，又區分為四路；若以大區域劃分的觀念，或失於簡略，例如廣大的東南地區，包含了七路，其中福建路情況特殊，各方面又有別於其他各路。因此本文在進行分析時，所採取的地域劃分即是綜合上述的北宋行政區劃以及宋代大區域劃分的觀念。將北宋全國分為十四

<sup>58</sup>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序言，頁6。

個大區域：分別是京畿(開封府)、京東(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京西北路、京西南路)、河北(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河東路)、陝西(永興軍路、秦鳳路)、淮南(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兩浙路)、江東(江南東路)、江西(江南西路)、福建(福建路)、兩湖、川蜀、兩廣。其中將夔州路、利州路、梓州路、成都府路等四路，合稱為川蜀地區；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合稱為兩湖地區，廣南東路、廣南西路合稱為兩廣地區，蓋因這些地區在自然環境、人文風俗較為相近，故可將其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討論。

茲將北宋翰林學士的地域分布列表如下：



表 2-4：北宋翰林學士地域分布表<sup>59</sup>

時間 地域	太祖朝		太宗朝		真宗朝		仁宗朝		英宗朝		神宗朝		哲宗朝		徽宗朝		欽宗朝		北宋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總數	%
京畿			1				4				2				6				13	5.7
京東	1		1		3		9		2		2		2		1		2		23	10.2
京西	1		2		2		3		1		2				2				13	5.7
河北	5		6		7		5				1				2				26	11.4
河東			1				1								1				3	1.4
陝西	1		2		2						2		1						8	3.6
北方總計	8	89	13	76	14	64	22	38	3	33	9	24	3	14	12	29	2	15	86	38
淮南			2				4				4		1		6		1		18	7.9
兩浙					2		7		2		7		3		10		5		36	15.7
江東			1				1							2					4	1.8
江西					4		5				4		3		2		1		19	8.3
福建					1		7		1		6		7		4		1		27	11.8
兩湖					1		4		1		2						1		9	3.8
川蜀	1		1				6		2		5		4		5		1		25	10.9
兩廣							2												2	0.8
南方總計	1	11	4	24	8	36	36	62	6	67	28	76	18	86	29	69	10	77	140	61
不詳	0		0		0		0		0		0		0		1	2	1	8	2	1
翰學總計	9		17		22		58		9		37		21		42		13		228	100

<sup>59</sup> 籍貫以《宋史》各列傳記載為主，若籍貫在遼國境內者，一併算入河北路，如竇儼、竇儀、扈蒙等人。籍貫不詳者分別為徽宗朝的王能甫與欽宗朝的詹義。不過有些人物值得注意，例如陳堯佐、陳堯咨本為四川人，其父陳省華很早就帶著兩兄弟到開封任官，其生長環境皆在開封，故宋人或將兄弟二人視為開封人。見(宋)晁補之，《雞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64，陳知和墓誌銘，頁8上。呂公著本是壽州人，從小與其兄呂公弼一同隨叔父呂蒙正、父親呂夷簡在開封長大，宋人也有把他視為開封人者。見(宋)王安禮，《王魏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7，呂公弼行狀，頁27上。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從表 2-4：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就整體而言，北宋翰林學士南北的地域分布為北方人佔 38%，南方人佔 61%，不詳佔 1%。北方人由絕對優勢，逐漸轉變成為弱勢，而南方人的比例恰恰相反，由宋初的少數，逐漸轉變成為絕對優勢，其中的關鍵轉變發生在仁宗朝。

第二，若以仁宗朝為分界點，仁宗朝以前(即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北方人佔有絕對優勢，比例高達 73%，南方人僅佔 27%，此時翰林學士可以說是北方人的囊中物。仁宗朝以後，南方人開始興起，北方人僅佔 28%，南方人則高達 71%，不詳佔 1%。

第三，從翰林學士的區域分布來看，前五名分別是兩浙(15.7%)、福建(11.8%)、河北(11.4%)、川蜀(10.9%)、京東(10.2%)，其他分別為江西(8.3%)、淮南(7.9%)、京畿(5.7%)、京西(5.7%)、兩湖(3.8%)、陝西(3.6%)、江東(1.8%)、河東(1.4%)、兩廣(0.8%)。

第四，以仁宗朝為分界點來看，宋初三朝翰林學士的區域分布，前五名分別是河北(38%)、京東(10%)、京西(10%)、陝西(10%)、江西(8%)，前四名都是北方地區，南方僅有江西路擠進第五名。仁宗朝以後翰林學士的區域分布，前五名分別是兩浙(18.9%)、福建(14.4%)、川蜀(12.8%)、京東(10%)、淮南(8.9%)，北方地區僅京東路居於第四名，其餘皆是南方地區。顯示宋仁宗朝以後，南方地區的興起，尤其表現在兩浙、福建、川蜀等地區。

接下來，將此情況與整個北宋文官的地域分布做一個比較。為了表現文官地域分布於北宋各時期的發展特色，將其區分成為三個時期：北宋前期，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北宋中期，包括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北宋後期，包括哲宗、徽宗、欽宗三朝。茲列表如下：

表 2-5：北宋文官地域分布統計表<sup>60</sup>

時間	地點	京畿	京東	京西	河北	河東	陝西	北方某地	北方總計	淮南	兩浙	江東	江西	福建	兩湖	川蜀	兩廣	南方某地	南方總計	不詳	官員總計
		北宋前期	人數	13	31	19	46	7	17	0	133	2	5	7	3	11	1	11	2	0	42
	%	7.4	17.7	10.9	26.3	4	9.7	0	76	1.1	2.9	4	1.7	6.3	0.6	6.3	1.1	0	24	0	100
北宋中期	人數	23	63	49	45	2	18	1	201	28	40	15	19	20	9	19	2	0	152	2	355
	%	6.5	17.7	13.8	12.7	0.5	5.1	0.3	56.6	7.8	11.3	4.2	5.4	5.6	2.5	5.4	0.6	0	42.8	0.6	100
北宋後期	人數	22	16	25	21	0	15	0	99	23	55	10	26	35	5	21	0	2	177	0	276
	%	8	5.8	9.1	7.6	0	5.4	0	35.9	8.4	19.9	3.6	9.4	12.7	1.8	7.6	0	0.7	64.1	0	100
仁宗以後	人數	45	79	74	66	2	33	1	300	51	95	25	45	55	14	40	2	2	329	2	631
	%	7.1	12.5	11.7	10.5	0.3	5.2	0.2	47.6	8.1	15.1	4	7.1	8.7	2.2	6.3	0.3	0.3	52.1	0.3	100
北宋	總數	58	110	93	112	9	50	1	433	53	100	32	48	66	15	51	4	2	371	2	806
	%	7.2	13.6	11.5	13.9	1.1	6.2	0.1	53.7	6.6	12.4	4	6	8.2	1.9	6.3	0.5	0.2	46	0.3	100

資料來源：

《宋史》，卷 249~426，正傳、循吏傳部分，不包含宗室、道學以後各個列傳。

此表參考程民生《宋代各地官員數量統計表》製成，載於程民生，《宋

<sup>60</sup> 所謂的文官，此處指的是曾任文職之官員，若不曾任文職，則視為武官。

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2-134。

拿翰林學士群體來和整個文官集團相比較，可以看出以下數點：

第一，就整個北宋文官的地域分布來看，北方人始終佔有優勢，比例為53.7%，南方人則為46%，不詳者為0.3%。翰林學士為這群文官中的菁英份子，南方人的比例卻遠遠勝過北方人。

第二，北宋文官集團在北宋中期(即仁宗朝以後)亦開始出現南方人比例佔多數的情況(北方人佔47.6%，南方人佔52.1%)，此情形表現在翰林學士這個職位更為明顯，翰林學士中北方人僅佔28%，南方人則高達71%。

第三，從北宋文官集團的區域分布來看，前五個人數較多的地區分別是河北(13.9%)、京東(13.6%)、兩浙(12.4%)、京西(11.5%)、福建(8.2%)，與翰林學士的區域分布相比，其前五名分別是兩浙(15.7%)、福建(11.8%)、河北(11.4%)、川蜀(10.9%)、京東(10.2%)，有四個地區相符合，即兩浙、福建、河北、京東，惟一不同之處是川蜀，不過川蜀所佔的比例亦在北宋文官集團排名第八(6.3%)，其人數和第六的京畿(7.2%)、第七的淮南(6.6%)相較，差距在10人以內，亦不甚大。可見翰林學士這個高級文官地域的發展和整個北宋文官集團是相呼應的。

第四，以仁宗朝來看，北宋前期文官集團的區域分布前五區域分別是河北(26.3%)、京東(17.7%)、京西(10.9%)、陝西(9.7%)、京畿(7.4%)，全部都是北方地區，此時能夠與之抗衡的南方地區為福建(6.3%)、川蜀(6.3%)等地。仁宗朝以後，北宋文官集團的區域分布前五名分別是兩浙(15.1%)、京東(12.5%)、京西(11.7%)、河北(10.5%)、福建(8.7%)，其他如淮南(8.1%)、京畿(7.1%)、江西(7.1%)、川蜀(6.3%)，這樣子的發展趨勢和翰林學士的地域分布情況亦是相同的。

以上是將翰林學士放置在整個北宋文官集團來看，接下來再以北宋的高級文官宰相的地域分布做一個比較。先來看看北宋各期南北方宰相比例分析，茲列表如下：

表 2-6：北宋各期南北方宰相比例分析表

時期 \ 地區	北方		南方	
	人數	%	人數	%
北宋前期	19	90	2	10
北宋中期	12	48	13	52
北宋後期	11	44	14	56
總計	42	59	29	41

資料來源：

《宋史 宰輔表》

整體看來，北宋宰相的地域分布北方人佔 59%，南方人佔 41%，北方人佔絕對的優勢。不過北方人擔任宰相的比例，隨著時間的遷移而逐漸減少，明顯的變化在宋仁宗朝以後。北宋前期，北方人擔任宰相的比例為 90%，南方人僅佔 10%，仁宗朝以後，北方人的比例降為 46%，相較之下，便是南方人的明顯上升，到了北宋末期，宰相當中南方人的比例仍是勝過北方人。這樣的變動趨勢，亦是符合翰林學士發展的情況。

接下來再來看看北宋宰相詳細的地域分布情形：

表 2-7：北宋宰相地域分布統計表

時間 \ 地點	京畿	京東	京西	河北	河東	陝西	北方總計	淮南	兩浙	江東	江西	福建	兩湖	川蜀	兩廣	南方總計	宰相總計	
	北宋	9	6	7	15	2	3	42	4	6	0	6	9	0	4	0	29	71
	%	12.6	8.4	9.9	21.1	2.8	4.2	59	5.8	8.4	0	8.4	12.6	0	5.8	0	41	100

資料來源：

《宋史 宰輔表》

此表參考程民生《兩宋宰相地域分布表》製成，載於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 140-143。

由表 2-7 可知，北宋宰相的地域分布人數較多的前五名分別是河北(21.1%)、京畿(12.6%)、福建(12.6%)、京西(9.9%)、京東(8.4%)、兩浙(8.4%)、江西(8.4%)，整個地域分布的情形，和翰林學士沒有多大的差異。

藉由上述的分析，針對北宋翰林學士的地域分布情形，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結論：

第一，北方人勢力衰弱，南方人興起。所謂的北方人勢力衰弱，是相較於南方人的迅速興起。北宋前期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政府官員多以北方人為主，這是因為南方各地剛剛歸附朝廷，政府對於南方人存在防備之心所導致。此外，北方人也對南方人表現出輕視之心，開封人李穆說到：「吾觀江表冠蓋，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鉉)近之耳。」<sup>61</sup>言下之意，認為南方人皆不可取。北方人對南方人雖有防備、輕視之心，不過南方文人之文采，卻是獲得肯定的。宋太祖曾稱讚李煜為「好一個翰林學士！」<sup>62</sup>翰林學士都皆由才學豐富的文人擔任，而李煜更可以說是宋初南方文士的傑出代表。往後翰林學士發展趨勢正是如此。從宋初的北方人佔有絕對優勢，比例高達 73%，南方人僅佔 27%，到了仁宗朝以後，南方人反而後來居上，比例高達 71%，北方人僅佔 28%。翰林學士的發展情況，無疑是北宋時期南方興起的最佳例證。

第二，地域分布的轉變發生在宋仁宗朝，這和君主用人態度有關。相傳宋代有南人不得為相的家法，<sup>63</sup>姑且不論此事是否屬實，在宋初的太祖、太宗朝時期，南方人的確未有任相者。直到宋真宗任用王欽若為相後，此家法開始遭到破壞。為了王欽若任相一事，宋真宗曾詢問宰相王旦，王旦一方面指出祖宗朝未嘗以南方人當國，一方面又認為王欽若亦非公認的賢士，所以不贊成此事。直到王旦去世後，王欽若

<sup>61</sup> (宋)田況，《儒林公議》，收錄於《中國野史集成正編》6(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卷下，頁8下。

<sup>62</sup> (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頁60。

<sup>63</sup> (宋)佚名撰，《道山清話》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937。

才得以任相，並且說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sup>64</sup>翰林學士在北宋被視為宰相的候選人之一，受到此觀念之影響，南方人佔有之比例自然不高。到了宋仁宗朝時，大臣們唯才是任，無地域之分，陸游談到「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視，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sup>65</sup>皇帝用人不限地域，對於宋初以來備受壓抑的南方人才，自然有所幫助。

第三，地域分布的情形，和當地文化水準有關。北宋時期翰林學士分布區域以兩浙、河北、福建、川蜀、京東等地為主，這些地方都是北宋時期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仁宗朝以後，南方地區的崛起，這是因為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導致經濟重心的南移。這些地區中，河北人們多專經術，縣級的官學十分普及；京東人民質樸而好學，州郡官學、私人書院以及私塾教育皆極為發達；<sup>66</sup>福建的教育事業是全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不但官學興盛，民間教育亦十分普及，處處鄉校林立；川蜀「庠塾聚學者眾」，「聲教攸暨，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sup>67</sup>教育十分興盛；兩浙的教育發展情形較為特殊，北宋中期以前，兩浙許多州郡的教育處於落後狀態。仁宗朝開始，著名的學者如胡瑗、范仲淹等人皆在此地興學，促使兩浙教育的蓬勃發展。<sup>68</sup>

第四，翰林學士當中南方人的興起，和北宋的政治改革有關。在王安石變法期間，曾有過南北地域之爭。<sup>69</sup>此一現象，亦發生在翰林學士之中。王安石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受到宋神宗的青睞，君臣屢屢針對改革進行討論。王安石展開變法之後，翰林學士內部亦分成贊成與反對兩派，其中贊成者亦多是南方人。原因乃是宋神宗為了順利進行變法，在具有「天子私人」性質的翰林學士方面多安排贊成變法的南方人出任之緣故。這種安排方式，亦可見於唐代翰林學士王叔文展開變法之時。此後的北宋黨爭，多存在地域之爭，其中贊成改革者大部分

<sup>64</sup> 《長編》，卷90，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條，頁2075。

<sup>65</sup> (宋)陸游，《渭南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頁2下。

<sup>66</sup>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頁159-177。

<sup>67</sup> 《宋史》，卷89，地理五，頁2230。

<sup>68</sup>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頁177-203。

<sup>69</sup>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頁59-65。

皆曾出任翰林學士，而這些人又大多是南方人，導致北宋後期翰林學士裡的南方人佔有多數優勢。

第五，北宋後期翰林學士中南方人佔多數的情況，亦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賈志揚研究宋代科舉時指出，南方士人藉由科舉考試的成功，崛起於微賤之中，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已逐漸在行政機構中佔統治地位。<sup>70</sup>翰林學士的出身，有 93.9% 來自科舉考試，其中又以進士科為主，這種出身情況，是促使南方人在翰林學士裡佔有重要比例的原因。

總之，翰林學士發展的趨勢，和宋代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重心南移的情況相一致，作為文臣的精英份子，翰林學士此一職務南方人興起的情況更為突出。

### 第三節 遷轉與發展

#### 一、整體的官職遷轉

為了充分表示翰林學士官職遷轉的狀況，此處的分析有別上述的各種分析，將以北宋各朝任命翰林學士的實際入出院情況作為分析對象，其中包括了跨朝入充、一朝多次入充的情況，因此北宋各朝任命翰林學士總計 272 人次，其中有直學士院、權直學士院者，後來正除為翰林學士，並未出院，故出院者僅有 261 人次。北宋官制可以元豐改制作為分期標準，區分為以下兩個時期：一為北宋前期，這段期間指的是宋初至元豐三(1080)年六月；二為北宋後期，這段期間包括元豐三年六月至靖康二(1127)年北宋滅亡為止。茲將北宋前期翰林學士整體入出院的遷轉情形列表如下：

<sup>70</sup>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1995年)，頁179-230。賈志揚不只指出科舉考試中南方興起的現象，對於宋代進士的分布、科舉成績的狀況、地域的偏向情形，都有深入的分析。



表 2-8：北宋前期翰林學士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

入院前職事官	人數	%	出院後職事官	人數	%
知制誥	93	53	知州府	50	30.4
知州府	30	17	參知政事	28	17.1
無	19	11	樞密副使	15	9.1
權御史中丞	12	7	同知樞密院事	3	1.8
翰林學士	3	2	卒於任	19	12
樞密直學士	2	1	無	15	9
翰林學士承旨 <sup>71</sup>	1	0.5	權御史中丞	13	8
判國子監	1	0.5	三司使	5	3
兼判大理寺	1	0.5	致仕	3	1.8
判吏部銓	1	0.5	分司西京	3	1.8
知理檢院	1	0.5	知制誥	3	1.8
充戶部使	1	0.5	知審官院	1	0.6
分司西京	1	0.5	判尚書都省	1	0.6
轉運使	1	0.5	不詳	5	3
入判尚書都省	1	0.5			
糾察在京刑獄	1	0.5			
三司使	1	0.5			
知審官院	1	0.5			
不詳	5	3			
總計	176	100	總計	164	100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  
《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由「表 2-8：北宋前期翰林學士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可知：北宋翰林學士入院前的職事官，以知制誥(53%)、知州府(17%)、無職事官

<sup>71</sup> 入院前職事官為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者，表示他們為前朝任命的學士，宋初受到留用，這些人分別是後周的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翰林學士竇儼、王著、李昉。

(11%)、權御史中丞(7%)為主要來源。

擔任翰林學士後，其主要的出路為出知州府(30.4%)、升任宰輔(即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等，總計 46 人，佔 28%)、權御史中丞(8%)、無職事官者(9%)，值得注意的是，卒於任者有 19 人(佔 12%)，這些人多是年老體衰的官員。

宋神宗元豐三(1080)年六月丙午(十五日)，下詔中書詳定官制，開始進行元豐改制的工作。其主要成果有三：一為詳定官制，二為正官名，三為實施新官制。<sup>72</sup>茲將元豐改制後翰林學士的官職遷轉狀況列表如下：

表 2-9：北宋後期翰林學士入院職事官遷轉表

入院前職事官		人數	%	出院後職事官		人數	%
官名	官品			官名	官品		
中書舍人	正四品	20	20.8	尚書左、右丞	正二品	18	19
知州府 <sup>73</sup>	從六品	18	19	中書侍郎	正二品	3	3
六部尚書	從二品	10	10.4	門下侍郎	正二品	1	1
六部侍郎	從三品	10	10.4	同知樞密院事	正二品	3	3
六部郎官	從六品	1	1	知州府	從六品	25	26
給事中	正四品	10	10.4	六部尚書	從二品	16	17
御史中丞	從三品 <sup>74</sup>	6	6	六部侍郎	從三品	2	2
無		3	3	無		14	14
大司成	從四品	2	2	給事中	正四品	3	3
殿中監	正四品	1	1	御史中丞	從三品	2	2
起居郎	從六品	1	1	卒於任		2	2
不詳		14	15	不詳		8	8
總計		96	100	總計		97	100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

<sup>72</sup> 張復華，《北宋中期以後之官制改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16-30。

<sup>73</sup> 《元祐官品令》實施後，上州知州為正六品，中、下州知州為從六品。

<sup>74</sup> 《元祐官品令》實施後，官品升為正三品。

《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由「表 2-9：北宋後期翰林學士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可知：元豐改制後，入充翰林學士者以中書舍人(20.8%)、知州府(19%)、六部尚書(10.4%)、六部侍郎(10.4%)、給事中(10.4%)為主。

翰林學士的主要出路為升任宰輔(即尚書左、右丞、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等，總計 25 人，佔 26%)、知州府(26%)、六部尚書(17%)、無職事官者(14%)。

由此可見，不論在宋代前期，亦或元豐改制後，擔任翰林學士後，得以升任宰輔者，佔總數的四分之一。此一比例，如同宋人洪邁所言，翰林學士為宋代政壇上的「執政四入頭」。<sup>75</sup>

最後，再以擔任北宋翰林學士後，是否能夠位列宰輔作為考察其政治影響力的標準，北宋總共任命了 200 位翰林學士，其中有 102 人後來得以位列宰輔，比例高達 51%。可見北宋官員進入翰苑之後，將來很有機會位極人臣，其前途不可限量。

## 二、特殊的官職遷轉

翰林學士承旨可以說是學士院的最高長官，其地位在諸翰林學士之上。在唐代翰林學士承旨在政治上的出路較一般學士為優，北宋的承旨是否仍持有這項優勢？先來看一下翰林學士承旨入出院的遷轉情況：

<sup>75</sup> 宋代的執政官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進拜，參見(宋)洪邁，《容齋續筆》，收錄於《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3，「執政四入頭」，頁251。

表 2-10：北宋翰林學士承旨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

入院前職事官	人數	%	出院後職事官	人數	%
翰林學士	21	49	參知政事	7	16
知州府	11	26	尚書左、右丞	8	19
六部尚書	4	10	中書侍郎	1	2
無	2	5	樞密副使	3	7
學士承旨	1	2	同知樞密院事	2	5
御史中丞	1	2	三司使	2	5
樞密直學士	1	2	六部尚書	2	5
入判尚書都省	1	2	知州府	9	20
不詳	1	2	無	2	5
			判西京留臺司御史	1	2
			提舉宮觀	1	2
			卒於任	2	5
			致仕	1	2
			不詳	2	5
總計	43	100	總計	43	100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  
《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由「表 2-10：北宋翰林學士承旨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可知：翰林學士承旨入院前的職事官，以翰林學士(49%)、知州府(26%)、六部尚書(10%)為主要來源，其中六部尚書在北宋前期為寄祿官名，元豐改制之後始成為職事官，此處之六部尚書指的是職事官。

至於成為翰林學士承旨後，其出路如何？升任宰輔者有 21 人，佔 49%，其次分別為知州府(20%)、三司使(5%)、六部尚書(5%)。和其他翰林學士相比，翰林學士承旨的政治出路較佳。

直學士院和翰林學士的差別，僅在於直學士院者未被正式任命為翰林學士，其他各式職掌皆和正除者沒有差別。其實際情況為何？茲將北宋直學士院官員入出院的遷轉情形列表如下：

表 2-11：北宋直學士院官員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

入院前職事官	人數	%	出院後職事官	人數	%
知制誥	8	33	翰林學士	11	46
中書舍人	5	21	知州府	5	22
權御史中丞	4	17	維持原官	1	4
給事中	2	8	判尚書都省	1	4
知審官院	1	4	知審官東院	1	4
戶部郎官	1	4	三司使	1	4
無	3	13	門下侍郎	1	4
			禮部侍郎	1	4
			給事中	1	4
			無	1	4
總計	24	100	總計	24	100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由「表 2-11：北宋直學士院官員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可知：直學士院官員入院前的職事官，主要來源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元豐改制後)等外制官員(54%)、權御史中丞(17%)、給事中(8%)、無職事官(13%)。

直學士院後，其出路如何？大部分的官員可以正除為翰林學士(46%)，其次為知州府(22%)。

權直學士院者，其性質如同「暫時代理」，北宋甚少任命，在南宋始常置，甚至有權直學士院長達兩年三個月的例子。<sup>76</sup>宋人徐度指出北宋翰林學士「遇闕則以侍郎給舍兼直學士院。」<sup>77</sup>北宋任命 14 位官員權直學士院，茲將權直學士院官員的遷轉情形列表如下：

<sup>76</sup> 此例子為南宋人李嶽，見《宋中興學士院題名》，收錄於(宋)何異撰，《宋中興百官題名》(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頁8下。

<sup>77</sup> (宋)徐度，《卻掃編》，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下，頁4520。

表 2-12：北宋權直學士院官員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

姓名	入院官名	出院官名
張澹	知制誥	知制誥
宋綬	知制誥	知制誥
胡宗愈	不詳	不詳
舒亶	給事中	無
慕容彥逢	中書舍人	兵部侍郎
李昉	給事中	翰林學士
韓駒	中書舍人	無
吳玘	不詳	翰林學士
莫儔	給事中	吏部尚書
李熙靖	無	無
詹曷	無	無
孫覿	中書舍人	無
譚世勤	禮部侍郎	禮部侍郎
李擢	中書舍人	給事中

資料來源：

《宋史》《長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  
《學士年表》、宋人文集、宋代地方志

由「表 2-12：北宋權直學士院官員入出院職事官遷轉表」可知：職事官無變動者 6 人(43%)，<sup>78</sup>升官者 3 人(21.5%)，貶謫者 3 人(21.5%)，不詳者 2 人(14%)，可見擔任權直學士院者，入出院後，職事官仍以維持原狀佔大多數，更可見其「暫時代理」的性質。

翰林學士整體的官職遷轉情況，以實際入出院人次而言，不論在宋代前期，亦或元豐改制後，擔任翰林學士後，得以直接升任宰輔者，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強。若從總人數來看，擔任翰林學士後，將來得以位列宰輔者，比例則高達 51%，相較於唐代的 32%、五代的 28%、十

<sup>78</sup> 李擢權直學士院前後職事官雖由中書舍人變成給事中，但兩者的官品同為正四品，故將其列入無變動者。

國的 42%，明顯高出許多，居翰林學士設置以來之冠。可見北宋官員進入翰苑之後，將來很有機會位極人臣，其前途不可限量。個別的官職遷轉情況，翰林學士承旨的政治出路較佳，升任宰輔的機會極高(49%)；直學士院者率多正除為翰林學士(46%)，而權直學士院者，入出院後，職事官仍以維持原狀佔大多數(43%)，更可見其「暫時代理」的性質。

#### 第四節 北宋翰林學士的形象

北宋翰林學士的社會地位十分崇高，宋人錢惟演出「人間之官，無貴於學士，雖貴極三旌，有所不迨。」<sup>79</sup>如此崇高的地位，與其身為天子侍從的身份有關。宋人章如愚指出「瀛州妙選，金鑾召對，代天子絲綸之命為翰苑之榮。」<sup>80</sup>元人馬端臨則認為「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sup>81</sup>臺長即指御史中丞，為御史臺的長官。宋代臺諫在政治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馬端臨將翰林學士與之相比擬，可見翰林學士的政治影響力亦不容小覷。「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sup>82</sup>此般話正是為翰林學士的政治地位提供最佳的說明。

皇帝對於翰林學士的人選十分重視，經常派遣名士擔任。宋太祖嘗謂宰相云：「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sup>83</sup>宋人曾肇在為皇帝擬制書時談到「翰林任親地密，於夫經營庶務，進退大臣，未嘗不預咨詢，非獨治翰墨、典訓辭而已。故特遇之寵不與他學士比，其重如此。非智能才諳拔出一時，豈稱公選。」<sup>84</sup>張洎赴翰林就職時，宋太宗謂近

<sup>79</sup>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 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4，頁5上，引(宋)錢惟演，《金坡遺事》序。

<sup>80</sup>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 續集》，卷36，臺諫，頁7上。

<sup>81</sup>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萬有文庫本)，卷54，職官八，頁491。

<sup>82</sup> (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7，頁106。

<sup>83</sup> 《長編》，卷4，乾德元年十一月壬申條，頁109。

<sup>84</sup> (宋)曾肇撰，(清)曾儼編，《曲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轉除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知制誥制，頁3上。

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sup>85</sup>就連皇帝都想出任翰林學士，可見皇帝對此職的重視。皇帝亦經常賜給學士院御製墨寶，使得學士院擁有許多別稱，如玉堂、摛文堂等名稱。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向宋太宗賜上《續翰林志》一書，獲得皇帝賜詩作為賞賜，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為此，蘇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此外，宋太宗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sup>86</sup>學士院因此獲得「玉堂」的雅號。皇帝御書賜榜一事，確為當時的盛事，不少機構都欲獲得此一殊榮。當祕閣落成後，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宋太宗亦賜予之。<sup>87</sup>政和五(1115)年，宋徽宗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sup>88</sup>學士院又增添一雅號。

官僚群對於翰林學士亦持有極高的評價。李昉便有翰林七盛事的說法：「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一也；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親事官隨從，六也；新學士謝恩後就院賜敕設，雖為舊事，而無此時供帳之盛也，七也。」由此七事，足見宋朝皇帝之厚待文臣。<sup>89</sup>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sup>90</sup>

翰林學士必由才學豐富之士擔任。王禹偁指出經過皇帝嚴格挑選，始得擔任翰林學士一職。「翰林學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呂蒙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

<sup>85</sup> 《長編》，卷34，淳化四年五月丙午條，頁749。

<sup>86</sup> 《長編》，卷32，淳化二年十月辛巳條，頁724。

<sup>87</sup> 《長編》，卷33，淳化三年八月壬戌條、戊辰條，頁738。

<sup>88</sup> 《宋史》，卷162，職官二 翰林學士院，頁3812。

<sup>89</sup> (宋)李昉，《禁林宴會集》，收錄於(宋)洪遵，《翰苑群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7，頁53。

<sup>90</sup> (宋)歐陽修，《歸田錄》，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1，頁611。



其數，言於聖選，不為不精。」<sup>91</sup>歐陽修知諫院時說到：「臣伏思翰林學士職重于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取才識，不限資品。」<sup>92</sup>待及歐陽修親任翰林學士後，又說到：「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眾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禮增重。」<sup>93</sup>歐陽修認為翰林學士是才德兼備之士，不但享有極高的聲望，政治上亦備受禮遇。王安石談到「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為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為無以稱。」<sup>94</sup>王安石藉由人們對翰林學士的期許，顯現出其崇高地位。另一名宋人綦崇禮亦指出：「學士職清地近，極天下文章之選，非深厚爾雅不足以代王言，非直諒多聞不足以備顧問。」<sup>95</sup>

大臣們樂意擔任翰林學士一職，吳奎認為出任翰林學士是一項「美遷」，<sup>96</sup>司馬光則認為這是「美官」。<sup>97</sup>

起草詔書是翰林學士的基本工作，於詔草擬詔書之際，翰林學士們遭遇許多令人感到榮耀之事情。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大為時人所榮。獲得此一殊榮者，只有翰林學士韓維與曾肇兩人而已。<sup>98</sup>元符三(1100)年正月，宋哲宗駕崩，當時尚未發喪，事在秘密，向太后召集宰輔，命翰林學士草哲宗遺詔。是時知樞密院事曾布捧硯，尚書左丞蔡卞磨

<sup>91</sup> (宋)王禹偁，《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卷21，「滁州謝上表」，頁303。

<sup>92</sup> 歐陽修，「上仁宗論學士不可令中書依資差除」，收錄於(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49，頁535。

<sup>93</sup> 歐陽修，「上仁宗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收錄於(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49，頁537。

<sup>94</sup>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卷56，「除翰林學士謝表」，頁10上。

<sup>95</sup> (宋)綦崇禮，《北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附錄上，「給事中可除翰林學士制」，頁3上。

<sup>96</sup> (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治平四年四月戊辰條，頁4。

<sup>97</sup> (清)黃以周等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1，治平四年四月庚午條，頁7。

<sup>98</sup> 《宋史》，卷319，「曾肇傳」，頁10394。

墨，宰相章惇親手將筆交給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後蔡京輒與人言曰：「始覺儒臣之貴也。」<sup>99</sup>

在給翰林學士的待遇上，亦可以發現皇帝優禮之處。宋初學士在禁中，前方常有兩名院吏引導。李昉於太祖朝擔任學士之時，發現太宗在南衙，僅有朱衣(院吏名)一人前引而已，李昉亦主動減去一人，成為往後的慣例。<sup>100</sup>太宗當時雖未即位，卻是皇帝的親弟弟，李昉自然不敢在儀制上超越之。另一個令翰林學士感到光榮的事情，便是皇帝於夜晚親賜臺燭，為其照明。宋太宗嘗夜幸玉堂，當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sup>101</sup>蘇易簡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翰林學士，此事亦成為宋代的慣例。熙寧三(1070)年，宋神宗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珪)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sup>102</sup>蘇軾擔任翰林學士時，夜晚嘗宿直禁中，獲得宋哲宗與太皇太后高氏的召見，其間談及宋神宗對蘇軾的賞識，蘇軾不自覺放聲大哭，在場眾人無不潸然淚下，「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sup>103</sup>皇帝賜燭送歸是翰林學士專屬的特殊待遇，其他官員若享有此待遇，往往會升任翰林學士。神宗初年，於夜晚召知制誥鄭獬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三制，之後更賜雙燭送其歸舍人院。此事不合常例，皇帝賜雙燭歸院屬於翰林學士的榮寵，好在此事「外廷無知者」，因此宋神宗遂拜鄭獬為翰林學士。<sup>104</sup>

皇帝舉辦的宴會，翰林學士常是出席的人員之一。乾德四年(966)年八月，宋太祖賜宴於紫雲樓下，出席的人員有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人。<sup>105</sup>雍熙二(985)年，宋太宗召宰

<sup>99</sup>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1，頁3050。

<sup>100</sup> (宋)歐陽修，《歸田錄》，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1，頁614。

<sup>101</sup> (宋)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卷1，故事一，頁2。

<sup>102</sup> (宋)沈括，《補筆談》，收錄於《夢溪筆談》，卷1，故事，頁234。

<sup>103</sup> 《長編》，卷409，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條，頁9965；《宋史》，卷338，蘇軾傳，頁10811。

<sup>104</sup> 《宋史》，卷321，鄭獬傳，頁10418。

<sup>105</sup> 《長編》，卷7，乾德四年八月辛丑條，頁174。

相，參知政事，樞密，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大臣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賦詩習射。此即宋代著名的賞花釣魚曲宴，亦成為宋代每歲皆舉行的宴會。<sup>106</sup>皇帝為犒賞將帥征伐的辛勞而舉行的宴會，翰林學士亦受到邀請。「舊制，每命將帥出征，還，勞宴于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sup>107</sup>宴會舉行之時，偶有意外發生。元符初，宋哲宗邀請執政侍從參與宴會，大臣們先後登上龍舟玩賞金明池。輪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登船時，龍舟突然遠去，蔡京因而落水。經過一番折騰，總算把蔡京從水中救起。同行的翰林學士蔣之奇說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京臉色不變，猶拍手大笑曰：「幾同洛浦之遊。」一時大家對於蔡京的大度頗感佩服。<sup>108</sup>蔡京是否真有大度，則未可知也。李元膺早負才名，聽聞此事後說到：「蔡元長都溼子肚裡文章也。」蔡京得之大怒，最後就不召用他為官。<sup>109</sup>

由此觀之，北宋翰林學士受到極高的推崇。在政治上，因為身為皇帝的侍從官，其政治影響力可比擬臺長；在文學上，又是極當時文學之選。皇帝對翰林學士的榮寵又是其他學士之冠，不但賜御製墨寶、賜臺燭引路，同時出席各種皇帝舉辦的宴會。北宋翰林學士政治地位之高，鮮有官員可以比擬。

<sup>106</sup> 《長編》，卷26，雍熙二年四月丙丁條，頁595-596。

<sup>107</sup> 《長編》，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丁卯條，頁759。

<sup>108</sup>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收錄於《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3，頁3074。

<sup>109</sup> 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13，蔡京，頁714，引自《高齋漫錄》。

